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今年9月26日，是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逝世58周年纪念日。记得前年徐悲鸿《春山驴背图》曾亮相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春拍会上。《春山驴背图》不仅是徐悲鸿唯一一幅手卷作品，通高36.5厘米，长达455厘米，而且是截至目前，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幅徐悲鸿的水水墨画长卷真迹。画面描绘精致，保存完美，并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题“春山驴背图”引首，以及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篆刻家寿石工、美学家邓以蛰等名家的数百字题跋。这件珍贵作品曾漂流海外，改革开放后今又以拍卖方式回流国内。

悲鸿先生在题款中说明了此卷的创作背景：“途

徐悲鸿与马衡、马彦祥父子的书画传奇

万伯翱

间忽忆翌日将应半农老友之命，为生平破天荒之工作，遂未能尽兴观山，匆匆而归，今日既画又复思索，乃两失之殊，可笑也。”画卷引首是马衡篆书“春山驴背图”，长卷展开北京西山之独有风光，见一古装骑驴者和一荷担者正缓缓地步入深山，各种秀美景致随即在观者眼前铺陈开……饱览过这4米半的长卷，人们无不被那出神入化的北京西山美景带入一种欢欣愉悦的境界。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况是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华北、北平危急。作者在创作《春山驴背图》时，其心境实在难以做到与金

山秀丽风光完美的统一；只得无奈地把日前所观处于危亡之际的祖国大好“春山”景色，通过“驴背”上的古装者，倒转时空数百年，展现给不愿做亡国奴的祖国同胞。



《春山驴背图》的现世，引起了我的诸多回忆。记得我在廖静文夫人所著《徐悲鸿传》中，只看到作者对此画的创作仅一笔带过：“悲鸿在北平还结交了五四时期的著名白话诗人刘半农先生，为他画过《春山驴背图》的画卷。”而传主创作此画的年份（1932年），及其是年的社会活动及创作活动均是空白。再查阅悲鸿先生年

谱，1932年也同样无所记。也许惠下一些回忆，可填补悲鸿先生这段历史空缺的遗憾吧。

由于与我有着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有幸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当年率领故宫人护卫故宫文物避日寇万里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结识了他的父亲——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并与这个享誉江浙（祖籍鄞县，今宁波）的马氏望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有幸的是我在马家亲眼观赏到徐悲鸿先生为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钱袋古籍和名家书画。“那是一幅与中国水墨画风格截然不同的素描肖像画，记得徐悲鸿先生的题款是：壬申春仲写，叔平老友。悲鸿。铃印：悲鸿。该画所铃之印正是马衡先生为其篆刻之印。创作时间与《春山驴背图》、《老柏图》同为“壬申春仲”即1932年3月（农历2月）。

这幅素描肖像应是我少时常去的马衡先生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家中所作。图中的马衡先生侧坐在客厅的白沙发座椅上，右手搭扶于椅扶手，左手手、食指间夹着一颗雪茄，双凝视，那神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殊不知为避日寇劫掠，当时的马老先生正在忙于故宫古物馆文物装箱，准备国宝南迁的大事。徐悲鸿先生笔下淡定的马衡先生，恐怕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后，竟临危受命国民政府，率领故宫同仁开始了历经12年的护国宝的万里大迁徙。在小文《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马彦祥先生家壁上所见徐悲鸿先生为马彦祥题写的楹联，上联是“谈笑发清秘”，下联为“耕耘获大奇”。题款曰：彦祥世兄雅令，壬申危亡之际。悲鸿。铃印。

这幅楹联当是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画像时，应



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曾回忆道：“那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幼小的我刚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徐悲鸿、董希文两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钱袋古籍和名家书画。”那是一幅与中国水墨画风格截然不同的素描肖像画，记得徐悲鸿先生的题款是：壬申春仲写，叔平老友。悲鸿。铃印：悲鸿。该画所铃之印正是马衡先生为其篆刻之印。创作时间与《春山驴背图》、《老柏图》同为“壬申春仲”即1932年3月（农历2月）。

这幅素描肖像应是我少时常去的马衡先生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家中所作。图中的马衡先生侧坐在客厅的白沙发座椅上，右手搭扶于椅扶手，左手手、食指间夹着一颗雪茄，双凝视，那神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殊不知为避日寇劫掠，当时的马老先生正在忙于故宫古物馆文物装箱，准备国宝南迁的大事。徐悲鸿先生笔下淡定的马衡先生，恐怕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后，竟临危受命国民政府，率领故宫同仁开始了历经12年的护国宝的万里大迁徙。在小文《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马彦祥先生家壁上所见徐悲鸿先生为马彦祥题写的楹联，上联是“谈笑发清秘”，下联为“耕耘获大奇”。题款曰：彦祥世兄雅令，壬申危亡之际。悲鸿。铃印。

这幅楹联当是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画像时，应

你为什么读书？我在朋友圈里发问，回答五花八门：为了前程，为了优雅，为好心情，为精神高潮，可治疗失眠，可排遣孤独，是内心需要，是一种习惯，在书里另外活一次，在书里遇见有趣的人和事……我这样发问，是因为我遇见了一位88岁长者，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读书，他的回答令我叹服：“读书让人成为勇士。”

“文革”时要他交代已故父亲“反动文人”罪行，他带上鲁迅的书，去问造反派头头：“鲁迅是反动还是革命的？”头头说当然是革命的。他又问那对鲁迅有帮助的什么人？头头说当然是革命的。他就翻开鲁迅的书给他们看，鲁迅说他读了蒋瑞藻的书“颇获裨助”，造反派头头哑口无言。蒋瑞藻正是他父亲，他名叫蒋逸人。在人人不敢多言逆来顺受的年代，他敢与造反派叫阵，真像一个勇士。

北宋初年一次农民起义的地点，历史书上如此认定，史学家前辈亦如此认定，而蒋逸人在读史过程中发现错误，拿出凿凿依据，后来整个史学界都改正了，书上说“据蒋逸人先生考订……”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其时不到三十岁的小蒋，竟敢挑战权威，真像一个勇士。

后来他成了右派，这样的胆识和性格，不成右派才奇怪。好在他学土木建筑时，跟工人学过木工、泥工、油漆工、混凝土工、钢筋工……到农村当了工匠队头头。公社组织政治学习，有个小组都是中学教师，领导指派小蒋当组长。教师们说，怎么叫一个工头来领导我们学习？结果小蒋从资本论谈起，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教师们佩服之至。他不怕命运多舛，真是勇士。

自古中国，有人读书读成书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读死书。读活的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啥都有。

也没错，读书首先与生存有关。而读书让人成为勇士，与真理有关。瞬间脑海掠过很多令人尊敬的名字，不必列举，你也想得起来。

在场的马彦祥大公子之请即兴一挥而就，与前两幅画作所不同的是，作者终于愤笔道出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的忧国之情。纵观徐悲鸿先生于1932年3月间，所创作的三幅风格迥然的作品，一幅附有马衡篆书首引的山水长卷，清凉淡然；一幅素描人物，神情自若；一幅书法楹联，“谈笑”，“耕耘”行笔神韵如画。画家的造谐，诚如齐白石在《春山驴背图》题跋中说：“今悲鸿君足迹诸国归来，目之所览，胸中有之从挥缣素，故能万怪千奇，无所不备”也。楹联款识称马彦祥“世兄”，一语道破了徐悲鸿与马衡、马彦祥父子交往关系。

追逐“华尔街”的法国银行

——外滩建筑之二十二：外滩29号

乔争月

外滩23幢临江建筑中，唯独29号有法资背景。这里曾先后作为利生银行、法兰西银行和俄道胜银行的行址。1912年到1913年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翻建了这座精致的小楼。

这家法国银行的上海分行成立于1899年，原在法租界的洋泾浜，却选择到公共租界的外滩建造新楼，应该是缘于外滩对金融机构的聚集和品牌效应。

丰子恺先生认为建筑这种艺术品因形状庞大，又与生活关系密切，是一种相当给力的宣传艺术。在“远东华尔街”上用一座建筑来代表自己，是高明的商业策略。

外滩在19世纪晚期成为金融中心。熊月之在《上海》一书中提到，1890年代起，英国银行独霸的局面被打破，各国银行纷纷抢滩上海。到1927年，35家外资银行设立了上海分行，多在外滩一带。其中俄资华俄道胜银行、德资德华银行、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各有一座江景绝佳的办公楼。

法国银行的“外滩旗舰店”由老牌的通和洋行设计并施工，呈古典主义风格，构图精美，这也是外滩仅存的一座3层楼建筑。

主入口的视觉中心是一个卷涡状的断山花。大楼的窗户上装饰了22根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多立克壁柱，却多而不繁。

设计的亮点是位于二层的一扇窗。三个窗洞设计为经典的帕拉蒂奥式组合——中间呈券形，高而宽；两侧的为矩形，低而狭。那是16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帕拉蒂奥的

经典构图，灵感来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门厅的两侧曾经是经理办公室。营业大厅里，柚木基座

的六根柱子支撑起石膏天花板和拱形天窗，此外还有买办的办公室。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中，法国著名史学家白吉尔用不少笔墨介绍了东方汇理的一位买办——出生于浙江天主教家庭的朱兆尧。他曾跟随任轮船招商局局董的舅父马建忠出使欧洲，见了大世面。回国后他帮助弟弟朱云佐创办自然科学杂志《格致新报》，1898年又接替弟弟担任东方汇理的买办。此人后来还下海创业，兴办机器厂实业，并成功地向老东家借到几笔巨额贷款。

东方汇理银行1875年成立于巴黎，是一家法国政府特许设立的海外殖民地银行，在云南的贸易金融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曾为滇越铁路建设募资。

1930年代担任云南分行行长



的拉撒（Guy Lacan）写过一本回忆录——《三十年代一位在云南的法国银行家》。在书中他生动记叙了当地浓郁的异国情调，如少数民族女子喜欢穿短上衣和有荒诞图案的短裙，她们的身影令火车月台显得绚丽多彩。

1955年银行结束在华营业，29号由市公安局使用。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有惊人的相似。”1990年代后，上海政府将国有企业单位陆续迁出外滩，重新引入金融机构以恢复这条昔日的“远东华尔街”。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作为首家国内金融机构成功置换进驻29号。

而29号昔日的主人其实也回来了。银行保留了老上海时代的中文名“东方汇理”，1991年先在外滩附近的延安路营业，1997年迁往国际金融中心，就位于上海的“新华街”——陆家嘴。这一追随发展机遇的举动，与百年前在外滩筹建新厦的决定，何其相似。

（插图：张雪飞摄影）

昨天：东方汇理银行

今天：光大银行
建于：1912到1913
建筑师：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
建筑风格：古典主义
地址：中山东一路29号

2007年，我被确定为上海市第五批援藏干部。到西藏之后，我做的比较大的一件事就是建设后藏的文化工程，有的叫宗山堡修复工程，有的叫“日喀则地区博物馆二期工程”，一期扫尾工作也是在我手里完成的。

这个工程意义重大在什么地方呢？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小布达拉宫”。所谓的“小布达拉宫”是跟拉萨的布达拉宫相比较的。西藏有后藏和前藏之分，前藏是以拉萨为中心，后藏就是以日喀则为中心，原来日喀则有一个政教合一的建筑物，就是“小布达拉宫”，后来毁于“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日喀则地委在沟通协商以后做了一个方案，准备在原址重建“小布达拉宫”。

重建工程的依据很少，只有一张上世纪二三十年外国人拍的照片能看到以前建筑物的模样，五六十年代的照片都没有。就是根据这张照片，我们上海同济大学的老教师竟然能够在山顶上建起了一个气势恢宏的1.2万平方米的建筑物，仿古外观，跟以前的日喀则“小布达拉宫”神似，内部则完全采取新的、现代建筑的结构。建好

以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都作了多次报道。

上海援藏项目是连贯的。第四批已经把建筑物立起来了，我们接手时，外观初步建好，组织上让我负责内部装修、装潢和里面的设备设施，比如电梯、生活设备、礼堂、剧场等，包括第一期布展。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工程建设，以前我是属于组织系统的，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当时回上海请教名师，做了很多笔记，掌握了他们做装潢施工现场和容易出现遗憾的几个环节，一个小本子都记满了。

我对工程的几个地方作了调整，其中之一就是把贵宾室布局作了调整，我把它扩大了，原来是30多个平方米，也就是一个小会议室，我把它扩大到100多个平方米。藏式的毯子、藏式的椅子，包括藏式的壁画、唐卡一挂起来以后，成了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接待场所。日喀则后来接待一些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包括北京来的一些重要领导，都放到这个地方来。在这里

既可以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又可以鸟瞰整个日喀则市的全景。如果当时要是建很小的话，二三十个平方米完全担负不起这个功能。

不管我到北京还是到拉萨，与日喀则籍以及在日喀则工作过的领导和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的时候，包括起名字他们都是热泪盈眶，都是很向往、很激动。比如，博物馆的模型在同济大学展出的时候，上海的一些在西藏工作过的领导，包括杨晓渡同志等人都非常激动，有的日喀则同志当场热泪盈眶。

这件事情在当地获得热烈的反响。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大妈坐车去拉萨睡着了，到了日喀则之后突然醒了，赶快叫车子停下来，说：“停下来，停下来，到了，到布达拉宫了。”她把我们的“小布达拉宫”误认为拉萨的真布达拉宫。实际上当地很多人在网上发帖子，对这件事情是十分地欢迎，由衷地赞美。

文化援藏有情感上的维系，这个“民心工程”，就能做好。

十日谈

援藏老师离开的那天，当地师生和很多人都哭了，明请看本栏。